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从世界大视野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创新^{〔*〕}

成 龙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2)

[摘 要]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模式的重大创新。相对于英美式现代化、苏联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创新突出表现在:人民主体、劳动本位的价值取向创新;注重效率、保障公平的经济形态创新;多元协商、全程民主的国家制度创新;古今中外、百花齐放的文化发展道路创新;互利共赢、命运与共的世界治理体系创新;改革引领、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创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法、植根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吸取世界现代化的有益经验,则是实现这种独特创新的基本前提,贯穿于每一创新的始终。

[关键词]世界大视野;中国式现代化;独特创新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3.02.004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的伟大创造,它的活力来自它的独特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创新在哪里?搞清这一问题是我们自立自信,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创新突出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人民主体、劳动本位的价值取向创新

任何现代化都是围绕一定的价值取向而加以建构的。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围绕劳动、

资本、国家的关系,先后形成两类现代化模式:以资本为主体的英美式资本主义现代化和以国家为主体的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英美式现代化建立在剥夺劳动的基础之上。“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2〕}国家成为资本的代言人和为资本服务的工具。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

作者简介:成龙,哲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浙江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逻辑及原创性贡献研究”(19ZDA016)的阶段研究成果。

的总资本家。”^[3]毋庸置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一些有识之士一再反思,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出现了一些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新因素。比如,社会保障制度的广泛推行,职工参与企业管理制度的规定,征收高额累进税,推行社会福利制度,资本社会化趋势加强,等等。同时,由于生产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劳资矛盾相对缓和,但这并没有改变国家为资本服务的性质。据美国《民族周刊》调查显示,美国家庭的财富不平等在1989年至2019年的30年间显著扩大。收入排在前10%的家庭所拥有的总财富份额从63%增加到72%,收入排在前1%的家庭所拥有的总财富份额从27%增加到34%。相比之下,收入最低的一半家庭所拥有的总财富份额从4%下降到2%。人权被肆意践踏。2020年美国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残忍跪压致死的惨案震惊了整个世界。总统选举完全受富人、名人、媒体和利益集团的操纵。2018年中期选举中,40%以上的竞选资金是由仅占美国总人口0.01%的富豪提供的。据统计,91%的美国国会选举取决于候选人是否获得最多资金支持,约70%的美国人政策制定没有任何影响。^[4]《政客》网站刊文指出,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美国制药企业针对两党进行了大量政治捐款,民主党政府上台后“投桃报李”,仅莫德纳公司就获益近10亿美元。联邦政府以大量采购新冠疫苗的方式直接向制药企业输送利益,造成美国疫苗大量囤积浪费。^[5]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始终把建立代表工农的苏维埃政权作为奋斗目标。晚年列宁一再强调,“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6]据此,他要求改组工农检察院,吸收工农中的优秀分子来充实检察院的工作,同时加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人员都应毫无条件地接受监督。“应该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还是某个其他中央委

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7]列宁深刻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公式。没有发达的工业,不但不能赢得国家的独立,而且根本无法谈论社会主义。俄国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为我所用。列宁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8]怎样才能把资本主义的一切拿来为我所用?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方案,要求办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迂回曲折地走向社会主义。客观上肯定了市场、商品、货币在俄国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在列宁去世不久,苏联很快放弃“新经济政策”,撤销工农检察院,形成国家主导的,以迅速发展重工业从而战胜法西斯侵略为目标的工业化体系,民主法制遭受严重破坏,党代表大会制为领袖独裁制所取代,人民几乎无权利可言,同时将资本、市场、货币完全排除在社会主义之外。特别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以党代政的官僚主义进一步升级,高级干部“带头”腐化堕落,享有各种特权,形成自成一体的贵族集团,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背道而驰。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试图借助所谓“新思维”,对整个“社会大厦”进行“根本改造”,声称“要一切从头做起”,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结果是,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改革效果,人民生活不升反降,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各种“魔鬼”趁机出笼,大肆活动、大造舆论,终于使苏联在剧烈的动荡中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状态,导致共产党下台,国家解体,葬送了社会主义。

中国式现代化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历史的活动和思想就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9]人民群众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者和依靠者,而且是资本的占有者和使用者,更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和监督

者,社会利益的创造者和共享者。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给中国共产党人定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且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0]人民群众是打不倒的钢铁长城。陈毅元帅曾不无感慨地指出:淮海战役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切国家机构都冠以“人民”二字。如最高行政机构称为“人民政府”、最高权力机构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多党合作机构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法院称为“人民法院”,检察院称为“人民检察院”,突出反映了新中国的人民性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邓小平把现代化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密切联系起来,制定了从“温饱”“小康”到“中等发达”的“三步走”战略,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评价改革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他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11]我们党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从恢复思想路线到端正组织路线,着力解决党和国家制度建设中的问题。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了退休制度、公务员制度、反腐倡廉制度、纪律监督制度,等等。同时,吸引世界各国的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借鉴各方面的管理经验,充分肯定资本、市场、货币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让资本为人民服务,同时对资本和市场进行国家监督,防止资本的无序扩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钉钉子的精神,着力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祛痾治乱,“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纠治顽瘴痼疾,刹住了各种歪风邪气,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各种隐患。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12]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的

人民本色。“人口规模巨大”这不仅是中国独有的国情,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制定战略策略的基本前提,同时还蕴藏着推进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巨大动力,只有人民群众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真正创造者。

二、注重效率、保障公平的经济形态创新

资本主义现代化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直到今天,私有制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基。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指出:“当前在发达国家,国民资本几乎全部为私人资本:90%以上,有些国家甚至超过100%。”^[13]社会主义不能采取市场经济的生产方式,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巨大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基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设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将利用自己的统治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用计划经济取代商品经济,从而消除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14]20世纪初,列宁在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复的试验和探索中,列宁深刻认识到市场的重要性,并且进行了以“新经济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试验,但在列宁去世后,苏联很快就宣布停止“新经济政策”的试验,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而完全加以排斥,形成了僵化的社会主义公式:“社会主义=清一色的国家所有制+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分配+激烈阶级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试图突破苏联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现代化道路,他批评苏联过早结束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认为“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15]中国可以再搞一段新经济政策,“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16]可惜的是这一思想并没有被贯彻到底。实践表明,当时的生产方式导致各要素之间关系

僵化、效率低下、缺乏活力,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没有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目的,人民生活一直在低水平徘徊,得不到应有的改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邓小平指出:要通过改革破除官僚主义,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尽可能快地为国家创造财富、增加个人收入,首次提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共同富裕决不等于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富裕有先有后、有快有慢,但“绝不是那种极少数人变成剥削者,大多数人陷于贫穷的两极分化”。^[17]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不可能是单一的,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原则,合理拉开贫富差距,又防止贫富悬殊。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的建议,首次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明确肯定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并初步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分配原则。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进一步勾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和基本框架。党的十五大针对社会上的各种议论,明确肯定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完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提出初次分配要注重效率,再分配要注重公平,加大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2007年3月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中华

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明确肯定: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加快经济方式的转变,努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又好又快发展”,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并且指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要进一步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18]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认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建设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19]党的二十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提高发展质量,要着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把发展重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20]同时,二十大报告还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的现代化,而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已有基本分配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居民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加大税收调节力度,“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21]中国式现代化自始至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同时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中国特色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英美式市场经济的综合创新,在西方教科书和传统社会主义教科书上几乎都是空白。其独特创新突出表现在:公有制为主体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和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相结合,提高经济质量同促进社会公平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中央集权同地方分权相结合,等等。这种新型现代化的经济制度在实践中展现出独特优势。意大利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洛丽塔·纳波利奥尼(Loretta Napoleoni)认为,“与苏联不同,中国成功地创立了一种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这一制度与其他体系相比在促进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方面无疑更为成功,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22]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曾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一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23]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自秦汉以来,中国就一直是一个“重农抑商”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初期曾照搬苏联模式,从另一方面排斥商品生产。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真正的腾飞之路,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形态。

三、多元协商、全程民主的国家制度创新

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将之作为毕生的研究课题。马克思在1843年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旗帜鲜明地主张人民主权论,批判黑格尔的君主主权论、君主立宪论。1844年11月,马克思《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一书,以法国革命为历史起点,谈论“现代国家起源”,粗线条地展开现代国家的理论建构。《共产党宣言》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夺得政权,使自己“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然后利用自己的统治,剥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

量。”^[2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以世界历史的近代走向为经线,以现代国家制度创新为纬线,简明扼要地研究了现代国家形成发展的六种类型,或叫六个阶段,并从资本积累的趋势预见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历史趋势。^[25]1871年,马克思执笔起草的《法兰西内战》,实质上是把巴黎公社的革命实践作为一个新型无产阶级国家的最初萌芽,阐发新型无产阶级国家根本超越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本质特征,认为公社“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26]1875年,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借探讨党的理论纲领、政治纲领之机,再次探讨了未来社会国家制度的创新问题,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与未来社会新型民主国家,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的重大问题。晚年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以及1895年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探讨了在新时代、新条件下,在普选制、民主制的和平形势下,走向工人阶级新型民主的现实途径,即通过共和国的路径,走向新型民主。然而,受时代条件的限制,无产阶级革命完成后,到底应该怎样组织无产阶级的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多是基于历史和现实的逻辑推导,还缺少无产阶级国家的具体实践。

列宁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如何进行新型国家建设,以保障每个劳动者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权利,保证工农当家作主,这是列宁晚年思考的核心问题之一。列宁深刻意识到,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建设其实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落后俄国的经济状况,文盲、半文盲的比例之大,党内严重的官僚主义,都严重阻碍着俄国新型民主建设的进程。列宁不止一次地尖锐指出苏维埃民主制在形式与内容上存在重大矛盾。为加强工农群众对党政机构的监督,列宁亲自主持通过《工人监督条例》和《罢免权法令》,强调实行工

人监督,“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于人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和任务”。1918年5月,为加强国家机关的监督工作,按照列宁的提议,成立了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1919年3月,列宁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对于改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法令草案,提出了修改意见,并致信起草这一草案的斯大林,中心论点是要求贯彻人民监督原则,让工人群众参与国家监察机关。1920年1月,列宁提出国家监察工作全盘工农化的原则,为了贯彻这一原则,他力主把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逐步改组为工农检察院,把国家监督与工农监督结合起来,并以人民监督、社会监督为主。1922年8月,俄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要求强化俄共自身的监督系统,特别是对俄共领导机关的全党监督。依靠党外普通群众进行清党的实践经验,加深了列宁的人民监督权思想。根据俄共十大决议进行的清党,有17万人被清理出党,占当时党员总数的25%,一定程度纯洁了党员队伍。令列宁感到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问题。官僚主义不仅渗透进国家机关,而且渗透进俄共机体,工农检察院几乎形同虚设,成了附庸。同时,党、国家、人民三支监察机构很不协调,难以构成统一强大的人民监督系统。^[27]面对这种困境,列宁经过苦苦思索,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强化人民监督权上。列宁最后之作《给代表大会的信》《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其中心议题都是强化人民监督权。然而,由于列宁过早去世,苏联模式从理论和实践上完全背离了列宁工农主体的国家构想,根本否认了人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发展方向,严重扭曲了反官僚主义的根本任务,取消党内民主,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人治代替法治,甚至个人独断专行。

创建具有中国特点的新型国家,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的抗日战争如火如荼时,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毛泽东就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即一个新民主主

义的共和国,“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一方面和旧形式的、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另一方面,“也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相区别”。原因是无论“欧美式的”,还是“苏联式的”,都不适合中国的国情。1949年9月,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国所要建立的是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组成联合政府,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由此创建了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和监督制约制度,并于1954年颁布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遵循“全党服从中央”“党指挥枪”“党管干部”的原则,保证了党的统一、军队的统一和国家的统一,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山头林立”的不统一局面。然而,由于国内外多方面的原因,一段时间内我们没有能够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些制度,甚至在某些方面违反和摧毁了这些制度。例如,以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等停止工作,废除了国家主席制度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创新国家体制新的历史进程。邓小平一再指出:要切实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必须通过加强法制保障人民民主,“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28]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着力解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官僚主义问题。西方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比如,注重法制的精神、舆论监督的方法、国家公务员制度、退休制度、反腐倡廉制度,等等,都先后被我们所吸收借鉴。但中国几代领导人又始终如一地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决不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邓小平指出:“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9]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定要从本国国情出发,“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3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并且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必须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行专门的系统阐述,为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3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要坚定政治制度自信。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体系化建构的总目标,“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形成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体系,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武装力量体系,联系广泛、服务群众的群团工作体系”^[32]。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对党和国家

领导制度进行体系化设计,提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治理体系的具体任务和要求。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当家作主。“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33]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34]这些论述,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有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国家制度体系,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具体来讲,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一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面的、具体的,体现在国家政权的机构、体制、制度等的设计、安排、运行之中。中国共产党与八个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不是互相对立、互相竞争的反对关系,而是合作和监督的关系,这就有效避免了党争纷争、相互倾轧的现象。“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35]。二是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统一。中国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而是实行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采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以及基层群众自治相结合的方式。“这样一套制度安排,能够有效保证人民享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实的权利和自由,保证人民广泛参加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36]。三是强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协商与参与相结合,中国不搞“联邦制”。这样的民主原则有利于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商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四是强调健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

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发挥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加拿大知名比较政治哲学家贝淡宁(Daniel A. Bell)认为,中国的政治模式能够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既具有现实性,也具有理想性。在世界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37]

四、古今中外、百花齐放的文化发展道路创新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型国家。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古老的中华文明受到空前冲击。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建构具有中国特点的新文化,成为无数政治家、思想家思考的重大课题。洋务运动期间,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实质上采取的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方针。“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激进派在积极主张现代化革新的同时,简单机械地全盘否定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中国方块汉字;保守派则以维护孔子、维护传统、“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名,根本否定中国文化需要划时代的大变革、大创新。在毛泽东的文本中,虽然他一再提到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要认真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但又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巨大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是拿大刀、长矛进行革命的“斗争哲学”,而儒家哲学则是讲究温良恭俭让的“中庸之道”。既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依靠孔夫子,那我们共产党人就依靠马克思,要划清界限、旗帜鲜明。

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文化被视为走向现代化的“包袱”,而一再遭到批判。在历次运动中,孔子及其儒学都被作为开历史倒车的典型而受到批判,无数的古书、古画、古庙被烧、被砸,传统文化遭受了空前的浩劫。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门的打开和西方文化的涌入,中国传统文化再次遭受贬低和否定。

90年代,一些人又把市场经济简单等同于“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唯“我”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仁爱观、义利观、诚信观被坑蒙拐骗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实用主义所取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一再反思历史,总结经验,破除各种禁区、禁令,重申“三不主义”,切实执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优秀传统文化开始进入中小学和大学教材,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得到开掘,中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涌现出一大批创新型成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中国现代化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面迈出新的步伐。他在山东考察时专门去看了孔府孔庙,到福建考察时又去看了朱熹园。习近平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38]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深刻阐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39]在习近平看来,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第一次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提出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闪耀着真理的光芒,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和“体”。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和“魂”,包含着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西方现代文明是人类现代化的精神积淀,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借鉴的“器”和“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立足中国,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但又不故步自封,与儒学复古主义划清界限;既吸收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但又不搞“全盘西化”,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划清界限;既坚持马

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又坚决反对在文化上搞官僚化、行政化的国家垄断主义,与实行文化专制的苏联模式划清界限。

五、互利共赢、命运与共的世界治理体系创新

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问题也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出于对世界大战的恐惧,为实现和平发展,成立了世界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两大阵营”,持续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争相进行军备竞赛,核战争的危險一再升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出现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局面。时至今日,全球问题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持续增加。生态环境危机、核战争危机、南北危机、文明危机、价值观危机,成为人类现代化进程面临的最为深层的危机。面对这些危机,美英等国为一己之私,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一味奉行“单边主义”,成为最大的“麻烦制造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先后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国际法庭、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并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国际刑事法院规约》,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全球移民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退群”已经成为美国的任性常态。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认为,“二战”以来引导世界的所有规则、政策和机构大都走到了尽头。“事实表明,这个世界正在偏离过去近400年来的历史轨迹”,^[40]这是很有道理的。依靠美国治理全球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幻想。

中国共产党人一直胸怀世界,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就首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使之成为我国独

立自主外交工作的基本原则。中国超越意识形态,与一切待我平等之民族建立外交关系。70年代,毛泽东又发表“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为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80年代,邓小平重新判断国际形势,认为“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41]要把“和平”和“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不是通过“战争”和武装干涉,而是通过“合作”与“对话”来解决国际争端,有的问题可以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来解决,必须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发达国家要拿出更多资金和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东欧剧变后,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推进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倡导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型国家关系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摒弃冷战思维和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强权行径,主张从根本上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共同应对人类发展面临的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贫困失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国际犯罪活动猖獗等全球性问题。江泽民指出:“如同宇宙间不能只有一种色彩一样,世界上也不能只有一种文明、一种社会制度、一种发展模式、一种价值观念”。^[42]进入21世纪,胡锦涛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突显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责任与担当。“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回答的是中国将致力于建设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其实质是我们党的国际秩序主张与行为准则。”^[43]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经历了由主流世界的反抗者、批判者、游离者,到接受者、参与者、合作者,再到倡导者、建构者、塑造者的转变,从一个负责的地区大国走向全方位负责任的大国。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一再分析世界形势的发展,认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一方面,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

球村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潮流不可阻挡。另一方面,少数发达国家秉持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对其他弱小国家恃强凌弱、巧取豪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加重,当今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其范畴所指,包括“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民族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多种内涵,本质上是和平发展的时代观、平等互利的交往观、义利统一的价值观、包容互鉴的文明观、清洁美丽的生态观、普遍综合的安全观的统一。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推进一大批关系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目,携手各方打造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中国已与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合作文件。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与各国一道,跨越发展鸿沟、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共同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得到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中国发布了一份包含32项举措的成果清单,覆盖全球发展倡议涉及的减贫脱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数字时代互联互通八个重点领域。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明确了维护和实现全球安全的核心理念、根本遵循、重要原则、长远目标和可行思路,为人类社会应对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闯过动荡变革期的“至暗时刻”,提供了思想引领,得到70多个国家的赞赏和支持。一系列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推动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擘画了路径、指明了方向,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担当。

六、改革引领、创新驱动的动力机制创新

任何现代化都需要一定的动力来驱动。英美式现代化建立在功利主义主导的丛林法则之上。出于无限扩大的资本积累的需要,英国历史上曾经上演“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迫使大批农民出卖土地、远走他乡,陷于极端悲惨的境地。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大批印第安人被屠杀,幸存者也被赶到西部更为荒凉的“保留地”。马克思说:“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44]除压榨本国人民,资产阶级还进行全球性的殖民掠夺。据统计,从16世纪到19世纪,西班牙从拉美殖民地榨取250万公斤黄金和1亿公斤白银。葡萄牙从巴西搜刮到至少价值6亿美元的黄金和3亿美元的钻石,而其从巴西蔗糖业取得的利润比从开采金矿和金刚钻矿所得利润要大10倍。相伴而生的跨大西洋黑奴贸易,接踵而至的英法德等国对非洲、亚洲殖民地原材料的攫取和市场的宰割,直至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入侵,都是依靠掠夺落后国家推进本国现代化的铁证。^[45]时至今日,美国除凭借美元霸权收割世界外,还进行着明火执仗的抢劫。伊拉克总统巴尔哈姆·萨利赫讲话称,自2003年美联军进入伊拉克以来,美国掠夺走伊拉克1500亿美元的石油。叙利亚政府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入侵叙利亚后,叙利亚现有83%的石油被美军偷走,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美军撤离阿富汗后,无理扣押阿富汗7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苏联式现代化是依靠国家行政命令建构起来的。当时苏联已不可能从殖民地进行掠夺,也无法得到国外贷款,工业化所需的资金只能依靠国家强制作用来解决。国家作为至高无上的唯一主体,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强制性、指令性计划,直接组织调度生产与分配,垄断了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上的决策权,把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与企业、劳动者的自主权,基本排除

在外。整个社会好像一个统一指挥、平均分配的大工厂,把高积累、高投入作为主要途径,以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高增长、高速度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46]这种高积累主要是通过农业全盘集体化、严格控制城市居民消费等方式实现的。苏联还采取增加税收、发行公债、动员居民义务捐款等各种方式来吸收居民手中的资金。这种建立在行政命令基础上的单一计划经济体制,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简单排斥市场机制,导致国民经济内部各种比例关系失调,失去了应有的生机和活力。

中国式现代化一开始就建立在改革创新的基础之上。新中国的建立本身就是对旧制度的破坏和创新。20世纪50年代,由于缺乏经验,中国照搬苏联现代化的模式。但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苏联模式的弊端。毛泽东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等文章,认为苏联式现代化“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47]过分的高积累“把农民搞得太苦”。他们走过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一定要破除对苏联的教条和迷信,打倒奴隶主义,埋葬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干中国式的现代化。在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鼓励音乐工作者大胆创新,可以把“两个半瓶醋合成一瓶醋”,搞出一些“不中不西”“非驴非马”的东西来。在阅读苏联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指出:只有《实践论》《矛盾论》不能解决现实的问题,一定要大胆创新,写出新的理论著作来。60年代,在全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中共中央逐渐调整各项政策,陆续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教育(六十条)、科学(十四条)、文艺(十条)等方面的工作条例。70年代末,我们党突破“两个凡是”的教条,迎来全面改革创新的新时代。经济上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设立经济特区,进而向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政治上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废除终身制、实行政企分开,进而向全面依法治国转变;文化上从恢复高考制度,

向全面教育创新,建设人才强国、文化强国转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把改革创新作为推进发展的第一驱动力。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创新能力,从根本上影响甚至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人才创新等。十八届三中、四中,十九届三中、四中全会专门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先后推出1200多项改革举措,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各领域的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48]为中国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中国正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转变,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加快应用,培育了智能终端、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新产品、新业态。我国科技事业发生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重大变化,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走出一条从人才强、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发展道路。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拓展科技创新之路,这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

注释:

[1][12][20][21][34][4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2,22,19,30,47,37,9页。

[2][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8-159,286页。

[3][2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9,158页。

[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美国民主情况》,《人民日报》2021年12月6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3月1日。

[6][7]《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

783、782-783页。

[8]《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20页。

[1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31页。

[11][29][30][4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213、359-360、96页。

[13][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中文版序”,第XVII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33页。

[15][16][47]《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94、170、24页。

[17]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年,第180页。

[18]《胡锦涛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43页。

[19][3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36页。

[22][意]洛丽塔·纳波利奥尼:《中国道路:一位西方学者眼中的中国模式》,孙豫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8页。

[23][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641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页。

[25]参见王东、刘军:《马克思列宁主义源头活水论——时代观、国家观、社会主义观》中篇,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45页。

[27][46]王东:《系统改革论——列宁遗嘱,苏联模式,中国道路》,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64-265、341页。

[2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页。

[32]《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6页。

[3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259页。

[35][3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93、288页。

[37]Daneil A. Bell, *The China Model: 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Limits of Democr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180.

[3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164页。

[39]《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5日。

[40][美]理查德·哈斯:《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重塑》,黄锦桂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序言”,第XI页。

[42]《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43]戴秉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当代世界》2010年第12期。

[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3页。

[45]冯维江:《从中西比较的视域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动力与优势》,《光明日报》2021年12月1日。

[责任编辑:刘 璠]